

世界课程与教学的理论与实践译丛

译丛主编 钟启泉

课程理论 实践

The Curriculum
Theory and Practice
(Fifth Edition)

(第五版)

【英】A. V. Kelly 著

吕敏霞 译

王斌华 审校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定阅读书目

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指定阅读书目

课程理论 与实践

与

The Curriculum
Theory and Practice
(Fifth Edition)

第五版

1982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2版

2001年11月第3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

THE
CURRICULUM
THEORY
AND
PRACTICE

世界课程与教学的理论与实践译丛

译丛主编 钟启泉

The Curriculum: Theory and Practice (Fifth Edition)

课程理论 与实践 (第五版)

【英】A. V. Kelly 著

吕敏霞 译 王斌华 审校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课程理论与实践 / (英) 凯利 (Kelly, A. V.) 著,
吕敏霞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7.3
(世界课程与教学的理论与实践译丛)
ISBN 978-7-5019-5723-1

I. 课 ... II. ①凯 ... ②吕 ... III. 课程—研究
IV. G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7160 号

版权声明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 A. V. Kelly, 2004.

总策划: 石 铁

策划编辑: 吴 红

责任编辑: 朱 玲 吴 红

责任终审: 杜文勇

封面设计: 四夕文化

版式设计: 时春雨

责任校对: 万 众

责任监印: 刘志颖

出版发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北京东长安街 6 号, 邮编: 100740)

印 刷: 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60 × 980 1/16 印张: 18.00

字 数: 24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9-5723-1/G · 678 定价: 32.00 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5-6676

咨询电话: 010-65595090 65262933

读者服务部邮购热线电话: 010-65241695 85111729 传真: 85111730

发行电话: 010-65128898 传真: 85113293

网 址: <http://www.chlip.com.cn>

E-mail: club@chlip.com.cn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读者服务部 (邮购) 联系调换

51274J5X101ZYW

《世界课程与教学的理论与实践译丛》编委会

主编

钟启泉：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工作组组长，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马云鹏：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王斌华：华东师范大学双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石鸥：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教授

石铁：“万千教育”总策划

陈晓端：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郭元祥：华中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夏惠贤：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系主任，教授

黄甫全：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课程与教学系主任，教授

靳玉乐：西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教师像艺术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一样，只有当他感到自己是在创造性动机的驱使下，而不是在外部权威的统治和束缚之下，他才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

——伯特兰·拉塞尔 (Bertrand Russell, *Unpopular Essays*, 1950: 159)

► 中文版序

英国学校教育体制历来有向公众证明其教育效果以获得教育经费的传统。1839年成立的皇家督导团专门负责学校教育的视导工作。1861年，“纽瑟姆委员会”制定了“按成绩拨款”的政策。1862年，国家通过了《修订法案》（*The Revised Code*）。在之后三十余年的时间内，学生考试在教育评价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法案，改变了学生考试控制整个教育形势的局面，国家并不强制全国统一采纳某一种课程模式，教育供给的责任转移到了地方教育当局的手中。战时联合政府颁布了《1944年教育改革法》，除了规定宗教教育为必修课外，没有颁布任何强制性的课程指令，教师也享有很大的专业自主性。因此，丹尼斯·劳顿（Denis Lawton, 1980: 22）将从1944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这一时期称为教师自主课程的“黄金时代”。这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课程的变革和发展带来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劳伦斯·斯滕豪斯（Lawrence Stenhouse, 1980a）认为，这一时期学校课程领域中的重大变革反映了英国教育史上的“课程开发”或“课程研究与开发”时代的几个最主要的方面。

20世纪60年代，人们反对11岁考试的呼声日益强烈，中等教育综合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这成为1969年发表的“黑皮书”攻击这一时期的教育变革的原因之一。“黑皮书”认为，它与混合能力编班、小学里推崇的进步主义教育方法等一起导致了文法中学教育水平的下降。此外，英国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 简称CBI）宣称，学校“基本技能”教学未能达到较高的标准，教育的经济功能也被忽视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石油危机使得英国的教育资源大大减少，教育转而侧重于追求“金钱价值”的功能。1974年成立的“人力服务委员会”（Manpower Services Commission）旨在调整毕业生素质与雇主要求之间的矛盾。1975年，英国的成绩评定机构（Assessment of Performance Unit, 简称APU）成立，重新以考试来加强国家对教育的控制。1976年，工党首相詹姆士·卡拉汉（James Callaghan）在牛津大学拉斯金学院的演讲中指责教师在课程中享有过大的自主权，错误

地使学生把大量的学习时间花在不能带来商业和经济效益的人文社会学科上。他倡导设立全国统一的课程或核心课程。英国社会对上述一系列情况反响激烈,尤其是拉斯金学院演讲引发人们开展了历时十余年的教育“大辩论”。保守党政府上台以后,继续加大了教育改革的步伐。在《1980年教育法》、《1986年教育法》及其他政策、法令、措施等的铺垫之下,英国二战后最重要的一部教育法——《1988年教育改革法》诞生了。它给英国教育制度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改变了英国政府的办学思想及教育管理模式,使英国教育体制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化。《1988年教育改革法》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建立了一套面向全国学生的、统一的国家课程(national curriculum)。

国家课程实施以来,公众反响不一,褒贬参半,理由纷杂。教育领域向来就是各种意识形态思想交锋的一个重要而又极具掩饰力的场所,而1988年以来的英国教育领域,如同本书作者凯利(A. V. Kelly)所言,“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情况:一些人之所以支持共同的教育供给(如赞成实施国家课程)的思想,是因为它能够实现平等和公平,然而正是为了同样的原因——实现平等和公平的理想,另一些人则大力反对这种教育思想,他们视共同知识的传授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和学生之间互相离间、疏远的源头。”在21世纪的今天,无论是国家课程的赞成者还是反对者,一切教育和课程变革的出发点似乎都有一个旨在实现社会民主和平等的响亮口号,但是“实现社会民主与平等之目标的适当的课程模式”的真正实现却成为课程研究领域的一大难题。在与历史的对照、比较中,本书作者从批判性的、社会学的视角,对国家课程的产生背景和实施效果进行了一个非常全面到位的剖析和介绍。此外,他还对课程与课程研究、教师在课程规划中的作用与地位、人类知识的性质、知识政治化、知识与课程、课程规划的内容模式、目标模式和过程模式以及课程开发、课程变革和课程控制、教育评价与学校课程政治化等问题,进行了立场鲜明和言之凿凿的分析与论证。最后,作者在批判现有国家课程的基础上,描述了另一种民主的、富有教育性意义的国家课程。这足以引发我们的反思。

寻找看待问题的适当角度,是贯穿和渗透于本书的一大特色。比如,国家课程实施以来,政府定期公布的“学校成绩排行榜”,或可解释为引进竞争机制的一种手段,亦可实现家长择校之权利,但是在作者看来,这些却是无关教育的无意义行为。再如,《1988年教育改革法》强调学校与企业之间

的联系，官方视之为培养学生具备迎接未来社会之挑战能力的举措，作者却将之看作非教育因素介入教育领域的不当做法。当然，这都是在充分和严密的论证之后得出的结论。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可特别留意于此。

王斌华 吕敏霞
2006 年秋

▶ 原著序

本书第一版出版之际，正值大家对课程及课程规划复杂性的理解飞速发展之时。此发展可归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首先，教育家及教师们正在努力开发更适合 21 世纪的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其实是政治状况的课程的同时，英国及其他一些地方，尤其是美国的学校课程领域正在发生着一些重大变革；其次，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对这些变革进行广泛的理论思考。事实上，当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学校委员会及其他机构的工作价值更多地存在于对课程的理论洞察方面，而不在于它所带来的学校及教师的实践工作层面。

1977 年，此书第一版对课程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应该给一些实践工作者和学习课程的人们带来了些许收获。我们尤其希望能说服教师意识到发展课程理论以支撑其工作的重要性，从而使此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教育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空白。正如第一版“序言”所述，此书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如果没有课程理论的支撑，人们只在学校外部努力以促进课程开发，有效的课程开发是不可能产生的。

五年后的 1982 年，本书第二版出版，此时的教育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教师和学生开始被封闭在“监舍”般的校园里。然而，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因为人们已准备采取一些基本立场——他们已认识到完善的理论思考对实践的重要性，并从教师应处于有效的课程开发的中心的角度证实了这一点。接着，进一步的、也许是预言性的论点被提出来了，此论点支持上述基本立场，认为教师需要从可靠的理论视角来反抗那些局外人制定并强加给他们的政策，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版“导言”中所述：课程建设的权力掌握在不能有效实施课程建设者的手中。

到 1989 年，本书第三版出版之时，各种纷争已不复存在，在第三版的序言中，我们描述了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对课程规划的影响。国家对课程规划的限制由幕后走向台前，而事实上，这些限制已经成为行政指令；课程评价变成了对教师的评价和教师责任制。在前两版中，本书非常强调教师在课程规划和课程开发中的中心地位，而现在，教师所发挥的中心作用被迅速削弱

了，其负责范围也明显地缩小了，课程开发的进展几乎未有效果。而且，课程领域的“隐秘区”（即评价的某些应保密的方面。——译者注）也被公之于众，正如在其他一些神圣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一样，课程研究走向僵化并畏缩不前。起步不久的课程研究遭到了破坏，就像花圃遭到了践踏。

写到此，人们会清楚地记起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教育政策中所发生的一些显著变化，有些变化达到了其顶点。它们主要表现为《1988 年教育改革法》的颁布，国家课程及其附属课程的建立，以及教育标准办公室（the 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简称 Ofsted）对他们所进行的定期的评估工作和视导工作等。也许，政策改革在其范围和效果方面已经达到了非常极端的程度，同时，类似的变化也出现在其他地方。因此，这些问题不仅是出现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或者说，他们不仅出现在整个英国。真实的情况是：这些问题的表现形式多样，困扰着整个“自由”世界的教育供给。

在此背景下，在第三版中，本书反复重申了前两版所强调的那些根本性原则。该版还提出了一些对政治家及其顾问们（此类人应该还包括理发师和清洁工，这一点业已经过了社会传闻的证明）的要求，因为他们充当了课程规划者的角色，有责任正确地认识教育规划：教育规划是一项相当复杂的活动，远远超出了一些业余者能够认识或者愿意去认识的水平。它需要人们的认识能够达到一定的理性深度，很明显，非专业者并不具备这个条件。过于简单地思考课程问题必将使教育处于危险之中，进而导致教育标准的下降，而非当前政策所声称的正在追求的教育标准的提高。

就本书及其历史背景来看，自第一次出版以来，它有两个可以被观察到的、耐人寻味的地方。第一，第一版试图总结和比较的一些见解不可避免地被遗漏了，这是学校未能独立评价教师工作的必然结果。学校课程没有进展，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小学，特别是小学的早期阶段），学校课程的研究已经退化到其早期或者更原始的形态了。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对课程变革和进展的一些正确见解被忽略了，甚至被完全地扼杀了。在我们目睹的政治强权面前，有关学校课程的讨论已逐渐失去其意义，如果说，人们对课程进展的认识不是完全停滞了的话，那么也是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也许最能证实这一点的就是本书第五版像第四版一样，继续使用早期实验和实践的材料，并用它们所引起的争论作例证，除此以外，似乎没有任何新内容。近些年的实践改革极少，只不过是对于一些过于简单的、强加到教育领域中的教育

政策及这些教育政策所导致恶果的修修补补。

第二，在教育领域出现了一种围绕着教育政治化以及教育含义的新的争议，这种观点认为教育的含义不仅包括其本身，还涵盖了民主和“自由”社会的概念。人们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到政治化过程上来，日益增多的兴趣转移到了下列方面：如民主的概念及其对教育供给的意义、各种意识形态的竞争对教育的影响、考试手段的使用、作为政治控制策略的教育督导手段和社会话语的合法化问题，以及出于对政治化过程本身的思考而产生的其他一系列问题。

不可避免地，人们的观点很容易仅局限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教育系统中，但其更广泛的意义却在于，提醒那些正在思索相似问题的人士意识到教育政治化对他们的真正意义及其所带来的危害。

因此，在当前背景下，本版的两个主要任务仍是：要明确从第一次出版至今的几十年中，真正意义的政治化过程对教育的主要影响；重申对课程进行开放式讨论的重要性，这种讨论在先前的政治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抑制。本书的重心应在于巩固前些年大范围讨论的成果——一些有关课程的认识和洞见，并从这些成果所提供的视角来审视政治化过程的意义。

而且，本版的写作背景主要是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地的教育环境。在这两个地方，专业人士所提出的警告开始被证实，忽视专家意见的政界人士及其他人士所犯的错误开始出现；同时，人们也开始努力纠正错误，尽管采取的是修修补补的态度，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教育体系中所出现的这些错误是一些根本性的错误，修修补补的态度并不足以能够有效地矫正之。现在，对课程进行高度集中的规划和控制（正如最初一些专业人员所预测）的不妥已经被认识到是体制的主要失误之处。这就是目前保守党所提供的解释——它并不承认现有体制为其所创。

因此，本版仍强调前四版所强调的基本原则，并明确了忽视这些原则所造成的影响。由于本书前四版的读者大多都就职于国外和其他工作领域，特此向他们提供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教育经验，将之作为一个范式，使人们了解在教育规划领域中应该避免的一些方面。

1977年以来，本书的前四个版本始终主张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和基本原则，第五版虽然仍未提供这些主张的根据，但它坚持认为有必要进行课程变革，变革不仅应该被强调，而且也应该将之落实到概念上；此外，对课程研

究的各个方面进行持续的讨论也是必要的。

重点还是要明确学习课程的人们以及在现有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中，那些有责任心的专业教育者们所研究的一些关键问题。令人振奋的是，相当多的人对此研究很感兴趣，由此，本书得以出版。与其他著作不同的是，它将仍然肯定 27 年前促成其第一版得以出版的那些价值观和基本原则。

目 录

第一章 课程与课程研究	1
什么是课程	2
教师的中心性地位	8
课程研究的关键方面	11
课程研究包括些什么	17
思考问题	24
建议阅读	24
第二章 知识与课程	25
人类知识的不确定性	26
知识政治学	36
对知识政治学问题的反思	45
思考问题	47
建议阅读	47
第三章 课程即内容与课程即成果	49
课程是教学内容，教育是内容的传输	49
课程是一种成果，教育是出产成果的工具	60
内容模式与目标模式的结合——“掌握学习”	77
这些规划模式的不适当性具有真正的教育意义	79
总 结	81
思考问题	82
建议阅读	82
第四章 课程即过程与课程即发展	83
一种公然宣称具有价值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模式	84
这种观点的发展过程	85

课程是一个过程——一些目的与原则	87
教育即发展	92
个人社会性的发展——民主权利的实现	97
合作课程	98
对发展性课程模式的一些批评	99
发展性课程模式的一些重大优点	105
各种课程的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规划模式	106
思考问题	109
建议阅读	109
第五章 课程开发、课程变革与课程控制	111
全国性的课程开发机构	112
课程变革与革新的推广	118
校本课程开发	126
行动研究与“教师即研究者”	130
通过中央权力实施课程变革	134
思考问题	138
建议阅读	138
第六章 学生评价、课程评价、教师评价及教师责任制	139
学生评价	139
课程评价理论	151
课程评价的政治化	161
教师评价与教师责任制	165
评价对教育研究的启示	170
总 结	176
思考问题	177
建议阅读	177
第七章 学校课程的政治化	179
直接与间接的政治影响	180
早期的历史背景	182
黄金时代	183

两种相互矛盾的发展态势	184
教师自主性面临的挑战	185
转向直接性的干涉与控制	188
一些重大的基础性错误	206
政府直接干预教育的一些假设	210
思考问题	213
建议阅读	214
第八章 一种民主的、富有教育性意义的国家课程	215
全国统一的课程所面临的压力	216
对共同核心课程观的论证	217
共同课程面临的一些困难和问题	220
“平衡的”课程	223
共同的过程与原则	225
国家课程的政治性论据	229
国家课程与课程研究、课程开发	233
国家课程对现有课程理论与课程研究的意义	237
民主的规则	241
一种民主的、富有教育性意义的国家课程的关键特征	244
思考问题	249
建议阅读	249
课程开发与变革年表	251
参考文献	255
本书参考的政府报告和官方出版物	267

第一章

课程与课程研究

很显然，过去二三十年里教育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在英国和其他地方，人们对教育体制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和修正。科技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同样程度的社会变革，在亲历这些变革的同时，我们对教育体制的特性与结构进行广泛的变革也就不令人吃惊了。教育体制是一种社会制度，应与其他制度同时变革；如果其他领域在变革而教育领域却岿然不动反倒会令人吃惊了。有必要说明的是，教育是一直在发展着的，它的发展不仅符合社会变革的情况，也符合我们对教育过程本身日益加深的认识程度，它是而且应该是教育研究尤其是课程研究的核心所在。

近些年来，课程变革的一个特征就是课程开发越来越有计划性和预备性了。过去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变革都可以被描述为无计划“倾向”（Hoyle, 1969a）的。在过去30年或者更久的时间段里，教育家们看到了有计划地进行变革的重要性：如果教育改革要与社会变革同步、相适应的话；如果教育改革要保持那些被视作超越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的标准和价值观的话；人们从近期的课程研究实践中加深了对教育和课程的认识，如果教育改革要符合人们的认识水平的话；那么，我们的态度就应是谨慎待之，而非听之任之。认识到这一点并非要在课程开发领域中使用完全的革命性的方法，与其他领域相比，在教育领域中使用超越革命性的演进式方法进行课程开发而带来的优势至少也是同样明显的。如果使用审慎的策略而不是让偶然性因素来控制课程变革的话，课程变革的进展会更顺利、快速和有效。

近期的课程改革实践（尤其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强调推动课程演变（curriculum evolution）而非实行课程革命（curriculum revolution）。我们看到，中央政治权力迅速加强对学校课程的控制而发生的一些改变，其某些方面的影响是革命性的，使得课程改革的进展并不十分顺利，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